

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

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

〔英〕安妮·勃朗特 著 赵慧珍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90149494

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

主编

可嘉



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

[英]安妮·勃朗特 著

赵慧珍 译

I561.4

1061

RBJ29/08

敦煌文艺出版社

书 名 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

作 者 [英]安妮·勃朗特 著 赵慧珍 译
责任编辑 刘铁巍
封面设计 刘惠星
版式设计 铁 薇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2
印 张 16.25
字 数 382,000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80587-377-1/I·336
定 价 22.8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编辑前言

在一九九六年春末夏初的马德里，伴随着国际出版家协会年会、国际图书节及西班牙文学成就展的盛况，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师泰斗。像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美国诗人约翰·乔尔诺、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等等。正是在此次会议上，他们之中有人预测并确认：本世纪末的世界文学走向是向“古典”回归。与此同时，将时间回溯半年至一九九五年岁末，地处中国西部的敦煌文艺出版社正式制定了“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的出版计划。丛书主题为：回归古典、回归传统。这或许能称之为一种契合、一种汇合于世纪末的契合。

当时间的巨手即将把二十世纪的百年之页轻轻翻掠而过之际，我们要做的很多，这其中包括思索、追溯、建构、重塑，等等。有关人士将这次世界性的回归的原因归结为：对本世纪喧嚣飞扬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厌弃和反拨。由于现代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过分崇尚形式的创新和文学的哲学内涵，从而使文学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艰涩，也越来越背离或远离读者。至此，曾经给二十世纪文学带来鲜活生机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却给文学造成深刻的障碍。长此以往，文学将有生存之忧。再者，二十世纪是创造主义的世纪，各种思潮、各种理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有一定的倾覆与瓦解作用。大破之后未必就有大立。文化的运动机制也越来越偏离文学的本原。世纪末的情绪弥漫着浓浓的失落与悲哀。随着家庭与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西方作家普遍感到前途渺茫，他们在慨叹与彷徨中向古典、向传统讨回失去的依托，便有了几分必然的意味。“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正是在文学本身的回复，社会观、价值观、婚姻观及道德观的修复上显示出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所选作家作品分别是：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庄园》，安妮·勃朗特的《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苏珊娜·穆迪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伊迪丝·华顿的《纽约旧事》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岁月》。这五位作家虽然所处时代、国家各不相同但在以上五部作品中都采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直接描写社会，如实反映人生，程度不同地洋溢着一种纯理性的道德醒世力量。

简·奥斯丁(1775—1817)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她一生拥有不少的桂冠，其中极为主要的就是“道德教育家”的桂冠。与其同时代的英国大作家司各特对奥斯丁的创作曾不断地予以赞誉：“这位年轻女士擅长描写平凡生活的各种纠葛，感受及人物，她这种才干我以为最是出色，为我前所未见。……那种细腻的笔触，由于描写真实，把平平常常的凡人小事勾勒得津津有味，我就做不到。”同时还被认为在“世界上再没有比她更不妥协、更无情小说家了。”在《曼斯菲尔庄园》这部小说中，她写的是传统德行的重要性。她极为推崇她的教养赋予她的那些基

本德行,充分肯定那些在道德问题上持有正确见解的人。她把自己与那些人们经常遇到而又容易分辨的美德联系起来。这也是《曼斯菲尔庄园》获得相当好评的原因之一。作者本人曾写道:“赫登先生正在第一次读《曼斯菲尔庄园》,他认为这本小说比《傲慢与偏见》好。”

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创作中取得突出成就的还有,“勃朗特三姐妹”中的安妮·勃朗特(1820—1849)。在她的力作《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中,显现出作者深刻和非凡的洞察力。她像一个客观的解剖学家向人们指出:自我放纵、邪恶和放荡会对人的品质起腐蚀作用,对社会同样会起腐蚀作用。作为本书魅力主要载体的海伦这个人物的性格,她的不同品质的奇特混合,是她的许多苦恼的根源,在她身上,安妮以无畏的诚实反映出一个急切的完美的性格,暴烈的脾气,汹涌的热情和正直不阿——这也正是安妮·勃朗特自己的性格。由于这部小说满含着对世人自鸣得意情绪的挑战,所以素来不太为世人接受。但它不仅仅真切地描绘了一群荡子的浪形,还真实真切地反映了一个放荡的社会侧影。也正因此,它才会长久地响彻着真实的声音。

伊迪丝·华顿(1862—1937),在创作上沿袭了简·奥斯丁的创作风格,是本世纪初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书中收录的像反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纽约生活的《老处女》及反映底层人们生活的《班纳姐妹》,都是传世的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

苏珊娜·穆迪(1803—1885),是加拿大文学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部在加拿大文学史上享有“经典之作”之称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是她最出色也是最真切的作品。

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的主要倾向是寻找一种现代艺术。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正是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的开拓者,是“意识流”小说理论的极重要的阐述者和成就者。然而正是这位“意识大师”却在1937年所著的《岁月》中峰回路转,转向了现

实主义的创作。她在日记中写道：它将包罗万象、囊括两性、教育、人生诸方面的问题……我发现自己已转换口味，对于事实极感兴趣，对于拥有难以胜数的大量事实极感兴趣。我想，我开始抓住了整体，在此书的结尾，日常的正常生活中的那种压力，将会继续存在。它并不是说教，但是，它将包含不可胜数的思想观念——历史、政治、女权、运动、艺术、文学——一言以蔽之，它将概括我所知道、感受的、嘲笑的、鄙视的、喜欢的、赞美的、憎恨的等等方面。《岁月》中伍尔夫把大量的事实和观念，纳入一部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中，表现了帕吉特家族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近半个世纪的经历。《岁月》出版后，在英国很受读者的欢迎，在美国一度成为畅销书。原因便因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之作。

这五部作品都是如此真实之作，都有一个如此真实的命脉，都将闪烁永久的真实之光。

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积累效应。每一代人都要在前人所创作的文化基础上才能进行的新的创造，使人类文化越来越丰富。人们衡量一本图书优劣，首先也是看它对文化积累、保存和发展有无重大价值。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积累和建设的过程，总是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合交流的过程。黑格尔在讲到接受前人文文化遗产时，说过：“当我们去吸收它，并使它成为我们所有时，我们就使它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有的特性”，“那种接受过来的遗产就这样地改变了。”这些遗产在出版中的演绎便是出精品，出高品位、高质量、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精品。“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或许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精品。同时在这套书中，我们还力图弥补一些翻译及出版界尚存对世界名著译介中的空白，与读者一同去认知她们和她们的作品。我们相信，虽然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但意义却是深远的。

有人说，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它可以使当时看来是坚实牢靠的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

得是脆弱的声望巩固下来。在今天,奥斯丁即使对于中国的读者也几近家喻户晓,然而作家在世时只发表了四部不署名的小说,在当时声望并不高,与同时代的司各特的盛誉简直不能相比。《傲慢与偏见》第一版只印了一千五百册,而几乎同期出版的司各特的《罗伯·罗依》两周内就销了一万册。在十九世纪的文学批评中,奥斯丁远远没有得到她在文学史、小说史上应有的地位。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她所赢得的赞誉可就非同一般了。首先经过读者和批评家的鉴定毫无疑问地确认为“公认的经典”。当代著名评论家艾德蒙·威尔逊指出:一百多年来,英国曾发生过几次趣味的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在奥斯丁于二十世纪声名大震的同时,原先十分煊赫的司各特却声誉大跌,且无可挽回。即使这样,对奥斯丁的认知仍是不完善的。提起奥斯丁,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或只能想到的便是《傲慢与偏见》。当然,《傲慢与偏见》确实是公认的奥斯丁最成功最伟大的小说,但被评论家称为“如此完善动人”、“毕竟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却受到了多方面的忽略,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同时被忽略的还有奥斯丁的另外四部作品。笔者认为,对于十九世纪欧洲作家恐怕没有谁比安妮·勃朗特更需要认知。虽说人人都知道“勃朗特三姐妹”,但安妮·勃朗特却始终湮没于两位姐姐夺目的光环之中,就像一个空泛的影子,附着在姐姐们的声誉之中。一百多年来一直如此。不是吗?中国读者知道夏洛蒂·勃朗特和《简·爱》,知道艾米莉·勃朗特同《呼啸山庄》,但肯定不知道安妮·勃朗特与《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在此我想引用克莱格·贝尔先生的一九六六年的一段评论,这或许是一家之言,却语出惊人。“除了《安娜·卡列尼娜》外,没有别的小说像《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一样将一桩婚姻从热恋到毁灭展现得如此真切,所写人性深处的善恶之争扣人心弦,整个英语文学中并不多见。在二十世纪结束之前,我们的后辈将发现以往对安妮和《怀尔

德菲尔山庄的房客》的评价一直有欠公正，他们将过晚地重新评价这部小说，确立其经典杰作的地位——超过《简·爱》，与《呼啸山庄》并驾齐驱。”

对于伊迪丝·华顿、苏珊娜·穆迪，我们对她们的认知远没有达到理应达到的程度。她们作品中所蕴藏的价值，远没有被我们所认识。同样，弗吉尼亚·伍尔夫也被低估了。英国文学发展史中整整一个时期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确实除了乔伊斯之外，未必还有其他英语作家在采用新的手法上曾取得比她更大的成就。法国著名评论家吉斯兰·杜南曾说：“人们习惯会把她与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等并列为二十世纪文学的奠基人。不过，只有她是女人，因的确没有他们那样驰名……”

正是有感于人类文学史上，这些极富才华，有着卓越成就，对人类文化宝库有过极宝贵奉献的女性作家，都有被曲折确认的经历，我们郑重地向读者奉献“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同时，还由于这五位非凡的女性作家，为我们塑造一批至今仍产生影响的女性形象。像奥斯丁笔下的伊丽莎白、范妮；安妮笔下的海伦；华顿夫人笔下的班纳姐妹；苏珊娜·穆迪笔下的穆迪夫人等等。同时，她们对妇女自觉、争取妇女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简·奥斯丁到安妮·勃朗特，再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后者都将前者的进程大大推进了一步。她们的作品是感人的，她们的人格也同样是感人的。丛书的出版，是我们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给予她们的回报。

最后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本套丛书的译者们所表现出的严谨的学者风范，正是他们精益求精的工作，确保了译文质量。



译者前言

安妮·勃朗特于一八二〇年一月十七日生于英格兰北部约克郡桑顿教区，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是该教区副牧师，母亲玛丽亚·勃兰威尔，一八一二年与帕特里克结婚，共生育五女一男，安妮是最小的一个。安妮出生三个月后，父亲升任邻近的霍沃斯教区教区长，全家迁往霍沃斯，一年后母亲去世，姨妈伊丽莎白·勃兰威尔前来管理家务。霍沃斯是勃朗特一家生活一生的地方，几个孩子在这里先其父而逝，一八六一年帕特里克也在这里去世。一八九五年勃朗特纪念馆在霍沃斯镇开幕，一九二八年迁至霍沃斯牧师住宅，这里遂成为一个受人崇仰的文学圣地。

除了安妮外，其余几位姑娘都在考文桥的教士女儿寄宿学校上过学。这所学校管理不善，致使学生体质极差，老大玛丽亚和老二伊丽莎白在这里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染上肺结核，于一八二五年五月和六

月先后夭折。夏洛蒂和艾米莉当年六月便辍学回家，此后五年多，四个孩子便在家里学习玩耍。一八三一年夏洛蒂到罗海德的伍勒女子学校上学，一八三二年回家，给两个妹妹授课三年，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八年，夏洛蒂回罗海德学校当教师，艾米莉和安妮才有机会先后随姐姐受了两年多的学校教育。然而勃朗特三姐妹的教育和学养主要是在家里获得的。其父虽是清贫的牧师，但颇具文才，出版过诗集和散文集，鼓励孩子的文学兴趣，孩子们自幼徜徉在父亲收藏的文学经典作品中，伴着《圣经》，读着荷马、维吉尔、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司各特长大。一家人都酷爱绘画，除夏洛蒂外，都善长音乐，也熟知伊索寓言和阿拉伯民间故事。母亲去世后前来掌管家务的姨妈是位严谨持重的基督徒，她给孩子们灌输一系列的宗教观念，诸如永罚，末日审判、上帝愤怒的火炉等，也对孩子们有深刻的影响。一八二六年六月勃朗特先生外出归来，给儿子勃兰威尔带回一盒十二个木制小士兵的礼物，四个孩子便围绕这些小木人儿编织以遥远的非洲为背景的想象故事，稍后，夏洛蒂和勃兰威尔合作编写了《安格里亚王国的传奇故事》，艾米莉和安妮则合编了《贡达尔王国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虽不具备文学价值，但从孩子们的童年起一直写到成年，成了勃朗特三姐妹磨练文笔的园地，也是她们自幼与文学结缘的见证。

一八四六年三姐妹合作出版了一部诗集，考虑到当时女作家不受人重视，三姐妹使用了男性笔名，夏洛蒂化名柯勒·贝尔，艾米莉化名埃利斯·贝尔，安妮化名阿克顿·贝尔。三姐妹生前出版的作品都分别用化名，引起三人是男是女，是一人还是三人等猜疑。这部诗集出版后毫无反响，当年只售出两本，但三姐妹并未因此停笔，不过都转而写起小说来。夏洛蒂最早写成《教师》，但没能出版，直到作家去世后于一八五七年才问世。一八四七年，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阿格尼斯·格雷》由纽比公司接受出版，同时另一家出版公司出版了夏洛蒂的《简·爱》。三部小说都受到

欢迎,但《简·爱》可以说立时引起轰动效应,以致有评论者猜测《呼啸山庄》和安妮于一八四八年出版的《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都出自《简·爱》的作者之手,为此一八四八年七月间夏洛蒂和安妮前往伦敦向她们的出版商表明几部作品的作者身分。

勃朗特三姐妹都有过当家庭女教师的经历,安妮先后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一八三九年来到米尔菲尔德的英汉姆家任教,时间较短,在她的第一部小说《阿格尼斯·格雷》(1847)中有反映。第二次是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五年间,在梭普格林的罗宾逊家任教,在她的第二部小说《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1848)中有反映。在这第二次为时四年的任家庭教师期间,安妮不但为今后的创作积累了经验,而且于一八四二年为放荡不羁、一事无成而失业在家的哥哥勃兰威尔谋得在罗宾逊家任家庭教师的工作。可是这位兄长太不争气,与罗宾逊太太暗中有染,事情败露后,安妮于一八四五年六月离开罗宾逊家,勃兰威尔也于一个月后被辞退。之后,这位兄长在霍沃斯消磨了他一生的最后三年,酗酒、抽鸦片,于一八四六年死于毫无节制的放荡生活。艾米莉在他的葬礼上受寒,并发了急性肺结核,于当年十二月十九日去世。紧接着安妮也染上同样的疾病,于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去世。两位妹妹终身未嫁,夏洛蒂于1854年在霍沃斯与她父亲的副牧师、爱尔兰人尼科尔斯结婚。然而婚后不到一年,因怀孕体力衰竭,怀着没有出生的婴儿离开人间。三姐妹中只有夏洛蒂的文学成就生前得到极高赞誉,两位妹妹,艾米莉和安妮,生前未享盛名。一八五七年另一位著名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出版长篇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是勃朗特姐妹传记中的第一部权威性著作,主要写夏洛蒂的生活和创作,同时将三姐妹一并记述,从而开创了后世文学史中勃朗特三姐妹一起论述的传统。

《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以下简称《房客》)于一八四八年七

月初出版,当月告罄,随即决定再版,为此安妮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再版序》。《再版序》的目的是回击当时评论界对《房客》及其作者的一些有欠公正的指摘,但因写得慷慨直率,正气凛然,遂成后世传诵的散文名篇。它的中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力主讲真话,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如实地描写生活,使文学起到警世劝世的作用,二是倡导男女平等,至少男女作家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上要享有平等权利。关于第一点,文学史上早有定论,安妮是十九世纪文学中最早自觉而坚定地走向现实主义的大师之一,时间上先于萨克雷、乔治·埃略特、特罗洛普等人,坚定性上也超过她的两位姐姐。两位姐姐是写家庭题材的天才,但作品仍有浪漫主义情调和神秘色彩,安妮则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英国小说的转折点。《房客》对现实和人性揭示之深刻,暴露之直率,完全印证了《再版序》中的主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再版序》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宣言书。第二点是在安妮的女作家身份为世人所知后才引起人们注意甚至震惊的。当时的评论界有人怀疑《房客》的作者是女性,便借此指摘作家写了女性不该写的事情,安妮针锋相对地质问道:“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任何真正有损于女性尊严的事,凭什么女人写了任何可以由男人来写的事就该受批判?”一句话从此封死了限制女作家创作题材的偏见之口,也引起后世多少赞叹。二十纪世中叶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回头重新审视昔日女作家,发掘女性文学传统,才发现《房客》可谓最早的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再版序》遂被誉为一篇女权主义的宣言书。也正是这两点,即真实与女权,构成了阅读《房客》的两把入门钥匙,而两把钥匙基本上挂在女主人公海伦身上,了解了这个人物形象,也就了解了《房客》全书。

海伦自幼丧母,由富有的姨妈养大,品貌出众,气质高雅,多才多艺,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大家闺秀。一年一度的伦敦社交季节里和

英俊富有的花花公子亨廷顿一见钟情，不顾姨妈的告诫，执意嫁他为妻。婚后不久，二人顿因气质不同而产生分歧。亨廷顿除了长相好，脾气好之外，几乎一无是处，花天酒地，享乐无度，无德无才无信仰，是典型的堕落荡子。海伦虽为情所迷嫁给他，但本性向善，注重道德，一心要挽救亨廷顿改过自新。夫妻间第一次争吵完全是亨廷顿引起的，他以给海伦讲他过去与有夫之妇私通的情景为乐，这种有辱妇女人格的做法激起了海伦的义愤，当晚她把丈夫关在房外，“决心要叫他明白，我的心不是他的奴隶”（第二十四章）。这也许是最早的女权意识的觉醒。今天看来这种对丈夫的反抗微不足道，但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社会和家庭中男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弱女子为维护自身尊严萌发此等微弱的反抗意识，也属难能可贵。

亨廷顿不以与有夫之妇私通为耻，反以之为自豪，后来自然发展到与安娜贝拉私通，毁了海伦的爱情。当海伦发现他与安娜贝拉关系暧昧时，亨廷顿引经据典地为他的不道德行为辩解，认为女人忠于丈夫是天性所致，男人的爱情“总比女人们流动些”，丈夫应多有些自由，一句话，在感情的忠诚上男女理应不平等（第二十七章）。这是一种强盗逻辑，然而在男权历史中这种观点一直受到男性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多少女性对它也未曾置疑。海伦则旗帜鲜明地要求夫妻对感情应当同等忠诚，“你和我调换一下想想，我要是这么做，你会认为我爱着你吗？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你会相信我的辩解吗？你会尊敬我，信任我吗？”（第二十七章）这种明确的女权意识在文学中也属于最早之列。后来海伦拿到了丈夫与安娜贝拉私通的第一手证据，便立即提出分手，亨廷顿不准，她便果断地中止了夫妻之情，只对他尽责尽义，直到亨廷顿代表人性之恶同她争夺孩子，她才下决心携儿出走。海伦的出走大概是文学上最早将女权意识付诸于实践的自觉行为，比被誉为最早的女权形象娜拉（易卜生《玩偶之家》1879）的出走早三十年。

海伦敢于反抗，继而出走，在一个妻子和婚生子女被视为丈夫私有财产的旧时代不愧为女权意识强烈的新女性，但仔细考察，海伦的女权意识是以维护正确的道德规范为基础的。海伦同丈夫决裂，是因为他背叛了她；哈格雷夫乘虚而入，海伦有时也冒出要以丈夫之道还治丈夫之身的念头，但她的道德意识战胜了哈格雷夫的引诱与纠缠。假如她为了报复丈夫的不忠，跟哈格雷夫私通或私奔，形式上同丈夫扯平，那就将敢于反抗的女权意识转变为道德沦丧，同安娜贝拉没什么区别了。她首先是道德家，其次才是敢于反抗的新女性，反抗以牺牲道德为代价，则是女性的悲哀。她的出走也是为了孩子不在丈夫教唆下成为另一个酗酒放纵的堕落之人而做出的决定，非为一己之私，不是单纯地追求个性的自由。后来遇到人品好感情真的马卡姆，她大胆地与之相爱，却又严守已婚女人的妇道，要求马卡姆努力将他们的爱情升华为精神之恋，到天国实现永恒之爱（第四十五章），这虽显得过于严酷，却透出一股崇高之气。也正是女权意识与道德意识相结合，才使海伦这个形象既鲜明突出，又厚重丰满。

当海伦得知丈夫病重，不久于人世时，又果断地回到他身边，服侍他直至最后。海伦这一走又一回，其意义不可低估。女权主义运动初期，对文学中女性的反抗与出走甚为关注，因为那是女权意识的直接表现。发展到后来，“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成了一个困扰女权主义的大问题。其实文学中连娜拉们如何出走也未曾解决，愤而出走将如何出走一笔带过，戛然而止，留给读者自由思考将出走后的问题一笔勾销。海伦出走早于娜拉三十年，却为如何出走、出走后怎么办两个问题提供了比较实际可行的方案。海伦既有敢于反抗的女权精神，又有道德理想，同时还具备清醒务实的理性头脑。当地下决心携子出走时，她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状况：没有财产，也不愿投靠亲戚，免得别人分担自己的痛苦和困难，惟一的出路是自强自立，自谋生计。于是她苦练画技，打下以画谋生的基础，

又说服弟弟收拾老家废弃的怀尔德菲尔山庄，供暂且避难之用。她不但不是愤然出走，而且在丈夫发现其逃走企图并对她实行经济制裁后，仍能沉住气，争取到老女仆雷切尔的同行和其他仆人的协助，连行李打包也妥善安排，真可谓计划周密。走了又回，看似是女权意识的挫折，实则是女权主义的升华，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女性境界。海伦回来并不是重新依附于丈夫，也并不是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而是出于基督徒人道主义理想的自觉选择。这种理想有两个要点：一是心怀善念，极富同情，在名分尚存的丈夫备受临终痛苦时要尽妻子一分责任；二是深信《圣经》中末日审判、不上天堂即下地狱的说教，要在丈夫临死前再次努力，劝其悔过，拯救其灵魂。反抗邪恶，拯救堕落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可以称之为“海伦情结”，这早在海伦结婚前与姨妈的争论中便显出端倪：海伦从《圣经》中寻得语录近三十条，论证坏人可救（第二十章）。婚后她一直坚持挽救丈夫，不停地劝谏，甚至在丈夫背叛她后，她仍然没有放弃救他摆脱恶习的希望。到最后她走而复回，做拯救丈夫灵魂的最后努力，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海伦出走是具有女权意识的反抗，也是她理想的破灭，回来则是她理想的复归，从而使行为意义上的女权意识有了精神上的升华。如果故事至海伦出走而止，全书就停留在反抗出走的物理意义上，海伦充其量是更早的娜拉；如果故事抽掉海伦复回一段，以海伦与马卡姆顺利结合而终，则充其量为出走后怎么办提供了一个物质方案，海伦的形象会因失去理想依托而黯然失色，全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会大打折扣。

海伦是女作家塑造的至善至美的道德理想人物，但并不是个无可挑剔的完人。她的婚姻经历了由热恋到毁灭的变化，她自己也在痛苦中从幼稚变成熟，在与人性堕落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她的另一面：固执、冷酷、严厉，到处训人，说教气十足。她对丈夫基本上是以斗争为主，不分场合，随时训之以理，以致安娜贝拉以情人的身分成功地戒了亨廷顿的酒，反过来劝海伦对丈夫“不要待之过

严,也不要放任不管”(第三十五章),这正是海伦失当之处,亨廷顿与安娜贝拉私通也有对海伦道德家的训斥难以忍受的因素。她对别人也是以道德家的身分自居,每一个人都听过她的教诲,受过她的指导。当然也有因地苦口婆心的劝诫而改好了的人,如哈特斯利,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她改造人性、拯救堕落的理想情结。坏人一个个败在她的高风亮节和铁嘴钢牙下,好人一个个对她的说教奉若神明。就在亨廷顿病重,她回来守护时,亨廷顿提出要见儿子,海伦则逼他立下字据,由她监护儿子,并随时可以带他离去,亨廷顿以手抖、眼昏、无力等一再推托,海伦硬是不准,直到签了字才罢(第四十七章)。这当然是亨廷顿一再欺骗海伦,逼得海伦不轻信口头承诺所致,但也能看出海伦太过的一面。这期间,亨廷顿怕死,海伦就说人固有一死,迟早而已;亨廷顿怕死后下地狱,海伦就说不悔过非下不可;亨廷顿回光返照觉得疼痛突停,海伦偏说这是不祥之兆(第四十八章),这固然都是实话,应该实话实说,但对一个临死之人,完全可以像医生一样顺着他哄着他。更有甚者,海伦为了戒除儿子的酒瘾,不惜采取往儿子喝的酒里下催吐酒石这种残酷手段,孩子每喝酒必吐,当然有效地戒了酒,但也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些都是海伦的不足之外,但考虑到她的痛苦经历和道德理想,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创作方法上讲,正是有了这些不足,海伦的形象才有血有肉,更为真实感人。

其他人物的塑造也都用这种“两分法”,尤其是书中的坏人。所谓坏人,并不是十恶不赦之人,都是些因享乐无度、放纵自己而逐步堕落下去的人。坏人也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各的坏法;除了亨廷顿死不悔改外,也有改过自新的,如哈特斯利和洛巴勒勋爵。就是亨廷顿也有脾气随和、容易相处的一面。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人物的内涵,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另一方面,作品的真实感也得力于直率暴露地描写了亨廷顿为首的几个堕落之人的堕落过程和堕落场面,作者甚至为此而受到“夸张渲染”、“对粗俗场面怀